

华夏风云丛书·挚友篇

耀亮的闪电

编 者：秦晓鹰等



华夏出版社

华夏风云丛书·挚友篇

耀亮的闪电

编者 秦晓鹰等

华夏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《华夏风云》丛书编辑委员会

顾问编审：温济泽

主 编：秦晓鹰

副主编：戴 晴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邱 建 铁竹伟 秦海波

秦晓鹰 黄济人 戴 晴

《华夏风云》丛书·挚友篇

耀亮的闪电

编者 秦晓鹰等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头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960×1092毫米32开本 6,376印张 108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900册

ISBN7-80053-115-5/K·019

书号：11484·019 定价：1.10元

目 录

- 天下为公 江俊孙(1)
孙中山轶事 管 瞻(14)
碧血横飞 国人一振 罗欣欣(27)
黄花岗上党人碑 殷 白(38)
刺杀袁世凯、良弼纪实 汪东林(43)
耀亮的闪电 峻 晨(47)
“火镖律师”传奇 万荣茂 吴威亚(57)
章太炎晚年与抗日战争 章念驰(78)
被毒杀的活佛 周锡银(94)
谢晋元与八百壮士 李 飞(108)
痛彻心扉的往事 王振华(125)
民主曾被无情践踏 辛 平(129)
“吾生尤爱石 谓是取其坚” 肖拱明(145)
匹夫不可夺志 汪东林(176)
军人，不能落伍 张庆泰 张 杰(181)

天下为公

江俊孙

凡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，都知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“天下为公”的名言。江俊孙老先生的这篇回忆，真实地记录了孙中山先生为作者的父亲挥毫赠送这一墨宝的经过……

在我家里，悬挂着一幅题额，正中是“天下为公”四个魏碑体大字，上款是“少峰先生属”落款是“孙文”。这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13年亲笔挥毫赠送给我的父亲江少峰的真迹墨宝，其间隐伏着父亲为中山先生事业殉身的事迹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无论人间历尽了多少沧桑巨变，这幅题额，一直是我们珍藏的传家之宝。望着“天下为公”苍劲挺拔的字体，往事就象云海一样，翻腾滚滚，我不由得回忆起孙中山先生对我们全家的深情厚谊，望着这幅匾额，我依稀想着青年时代亲自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情景。

我家祖籍于广东潮州，祖父江开俊，在潮州地方以经营钱庄为业。他为人正直，尤其恪守信用。深得同行业和客户的信赖，声誉甚佳。我父亲江少峰继承父业，对于金融事业，既热心又钻研，办事专注，

颇受当时金融界所注目。广东是孙中山先生传播革命思想最早的发源地。父亲在青年时代就受到浓郁的革命思想的熏陶，尤其对于孙中山先生更是崇拜异常。记得，在我孩童时代，他就给我讲述孙中山先生童年好学的故事，一股敬仰之情，溢于言表：他经常说：“吾人应当追随孙先生，推翻满清，还我中华！”

我父亲有一位青年时代的好友，名薛仙舟，在德国留学毕业回国。他是孙中山先生的知己之交，关系极为密切。虽然他不是国民党人，但是他却竭尽全力，倾家暗中相助孙先生的革命斗争，在国外暗暗联络同情者，扩大革命力量。所以受到孙先生的器重。薛仙舟不仅学问高明，而且为人旷达，不慕荣华。他不住都市，却甘居田舍茅屋，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。有些不了解其人格志向的人，都称他为“怪人”。

父亲与他交往甚为密切，他对我父亲十分信赖，无论多少银钱往来，都委托父亲经手，暗中调遣。父亲曾屡次提及他的高尚品格。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时期，许多追随者都急迫地争功做官，纷纷搬进华丽的洋房，而薛仙舟却依然故我，穿着布衣布鞋，过着朴素的生活。父亲曾对我讲述过一件轶事，我记得最为清楚。

有一次孙先生举行盛大的宴会。出席宴会的达官贵人们个个华服盛妆，将校武官，也是人人戎装

笔挺。盛筵开始之后，大门口来了一个布衣，手中拿着一顶破旧的纸伞，直奔官邸。门卫立即阻挡，不许他进入。这人微微一笑，从怀中掏出名片，要侍从通报孙先生，说他有要事商讨。门卫将信将疑，名片递进之后孙先生立即从楼上下来，亲自迎接他登楼，让为上宾。满座宾客莫不惊诧。这人就是薛仙舟先生。父亲敬慕地对我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，不求名，不要利，一心为国家。”从他的口吻里，我发现他是我父亲心目中的榜样。

辛亥革命后不久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，受到了重重阻挠，为了打开局面，挽救革命，急需大量的财政支援。薛仙舟乃是暗中资助人之一。他曾屡次与父亲秘密商谈，寻求财源，父亲为此四处奔走，并提出种种扩大财源的计划。这些建议不久受到了孙先生的重视。于是，在薛仙舟的建议下，父亲被孙先生召见和重用。从此，父亲明为经营钱庄，暗中作为孙先生之信徒，为革命筹集资金，竭尽全力奔走四方。

那时，中华民国成立不久，满清遗留下来是一个烂摊子。政府腐败不堪，百端待举。尤以财政陷于重重困难之境，处处受到当时的六国银行团的牵制。中山先生急于创办一家国家银行，联合世界各国的华侨界的力量，共同与之作抵抗。孙先生信任我父亲的爱国心和忘我的办事精神，乃委以筹办中国国家银行之重任。孙先生亲笔疾书写了许多信

件，委任父亲奔赴南洋各地与华侨金融首领、实业界、爱国人士，招股投资，开设银行，支援中华革命。在我家里，珍藏着孙中山先生关于此项事业给我父亲的亲笔信件。譬如有这样一封。孙先生写道：

弟前在粤时曾提议办一中西合资之银行，联合欧美最有力量银行以抵制六国银行团，而解中国财政之困难。当时以法国政府不大赞成，故巴黎之大银行家不敢发起。然一面仍尽力疏通政府，至两三月之前，已得法国政府之允许，故两月前法银行曾派两代表到上海商订章程。弟委人一面磋商章程，一面向各方面筹股本。时适沈万云君由南洋回沪，称已招得实业银行股本四五百万元。弟即与之磋商。将该股本并入，同办中西合资银行，以厚势力。初时彼满口应承，故电邀陆秋杰君，并中华银行招股人王奕友君，由星州来沪商量合并之法，后以实业银行发起人多不愿合并，弟遂欲另行组织一新行，为中西合资之基础，转思“中华”与“实业”两行在南洋招股已生出冲突，若弟更发起一新行则恐因而更甚，故不如其已。仍由中华两行各行其志而矣。弟前之赞成办银行招股者，以中国地大物博，银行愈多愈好，故实业银行、中华银行、福建银行弟皆出名赞助。

欲彼有成，初不料南洋招股，皆出于同一途也。兹中华银行发起人来约，愿以中华银行作弟欲办之中西银行基础。再委江少峰君来南洋招股，弟所议办之中西银行，乃联合世界上之大资本家而成者也。将来实能为中国银行之母。其势力可通贯全球。此银行一成，必能免六国之制我肘，及救中国之穷也。有五百万现金，则能成之。今中华银行既愿以该行为基础，则宜先招足中华之股本。然后与西人议订合同，从速开办也。故今日中西合办之能成与否，全靠中华招股如何耳。望足下在南洋竭力鼓吹，以达此目的。则中国实业前途之发达，可指日而待也。并望将此意转达各埠同志助力。幸甚。此致即候

大安不一

弟孙文谨启

民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

这是一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，它反映了辛亥革命之初，国父孙中山面临财政困难的事实，及其解决危机的对策。我父亲受命之后，与各方联系，经过紧张的准备，父亲肩负着中山先生的重托，携带了孙先生的亲笔书信，前往东南亚各国。他辗转于仰光、新加坡、雅加达、爪哇、吉隆坡等地，连家信也甚为稀少。从他仅有的几封信里，寥

寥数语，只是述说筹款在排除万难之后有了巨大进展。信中父亲只字不提他这时已经是抱病工作的景况。水土不服，气候不适，加上过度的劳累，在他回国之时，我们全家望着他那消瘦的病容，不觉震惊万分。

谁知，这时国内形势大变，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，篡夺了大总统的职位。中山先生处境更为艰难。然而，一批仁人志士，依然团结在孙先生的周围，父亲更觉担子沉重。这笔经过千难万险筹集的股金，一定要秘密保存，以免落入反动派之手。在孙中山先生的决策下，决定改变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。一部分退还南洋，另一部分先生再委派我父亲着手创建私人股份的中华商业银行。为此，父亲又顾不得治病，立即行动起来。

孙先生看到我父亲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，甚为嘉许。他亲笔挥毫写下“天下为公”的题额，其中倾注了先生的深情。先生派人送到我家之后，父亲郑重地请人裱妥，悬挂于室内醒目之处。他深情地说：“这是孙先生给友人的最高奖赏，很多人都想得到它，但先生不轻易礼赠。这既是荣誉，又是鞭策”。接着他又说：“这幅题额难道只是给我一个人的吗”？我说：“当然是给你的。”“你们看，少峰先生‘属’是什么意思吗”？我们都看不懂。父亲说“属”这里是指亲属的意思。就是说给我们全家的。听了父亲的解释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

我从小受父亲的教育，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，非常向往，播下了倾向革命的种子。我于北京医专学习的时候，1917年适逢“五四运动”，我就走上街头，写传单、贴标语、进行演讲，因此被反动军警拘捕，幸亏多方营救，才能出狱就学。在我的书桌里，至今还珍藏着街头演讲的照片，回忆起来，我的这番爱国热情，其源正出于受孙先生革命思想的启发啊！

1920年夏，我于北京医科学校毕业，回到上海，在薛仙舟的建议与安排之下，让我出国深造。父亲对我说：“德国医科发达，你应当去德国继续深造。最近期间，努力复习德语，做好出国准备。”我于是用功复习德语和其它功课。父亲也为我办理有关出国留学的申报手续。

有一天父亲郑重地对我说：“最近你不要出门。”“要我做什么事吗？”我诧异地问。“我带你去见一位大人物，衣着要干净些。”“到哪里去呢？他是谁？”父亲抚着我的头，慈祥地笑了说：“急什么，现在先不告诉你，要看他有没有空呢”。我不好再追问，只是内心纳闷而已。

盛夏已去，秋色渐浓。一天下午，父亲雇了一辆马车，回家后，立即兴冲冲地对我说：“换一件衣服，跟我一起走”，我心中一动，莫非就是去拜会那位大人物吗？

马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大马路，缓缓地穿过霞飞

路之后，路上车辆渐稀，行人寥落，不一会儿。驶进莫利哀路（现在名叫香山路），这是一条东西向的短街。西头是马思南路，东头紧挨法国公园（即现在复兴公园）。路两旁没有商店，一座座二层楼房，掩映在法国梧桐之间，显得分外幽静。马车徐徐停靠在路南26号门口（现在是香山路7号）。

这是一座二层楼木结构的法国式普通居民住宅。卵石嵌墙，呈深灰色。我与父亲下车后，家人在大门口引领我们进去，从东面的正门，进入内室。一进门是一条走廊，迎面是笔直的楼梯，楼上是孙先生的卧室和书房。我们走了几步，就转身朝南，进入了会客室。我挽着父亲坐在沙发上，家人端上茶水，请我们稍待片刻。父亲这时才悄悄地向我耳语说：“你马上可以见到孙中山先生了。”

我喜出望外，内心十分激动，趁这个间歇，用心打量着这里一切。这间正方形的客厅与隔壁一间餐厅，构成了这座楼的主屋。客厅大约有二十四五平方米左右。东边有一只壁炉，正南是二窗一门，可以通向室外走廊和南面的小花园，两边是通向餐厅的拉门，北面，进门的两侧，陈放着红木茶几和老式靠背椅，两侧壁上挂着四条名人书法挂屏，与茶几等，构成两面对称的陈设。正中有小圆桌和一套沙发。陈设是多么简朴。在这里看不到一点显示高贵身分的摆设和照片，也没有一件表示荣华的金玉饰品。我眼光透过门窗，但见庭院里绿草如茵，四

周几棵冬青玉兰，构成一道绿色的围墙，使得这座小小的院宅更显得朴素和幽雅。

正当我四下观望之时，中山先生穿着蓝色的学生装，伴着二三位客人从楼上走下来，他笑容可掬地迎向我们。在热情握手致意之后，就问我父亲近来健康状况怎样？看来，他从薛仙舟先生那里完全了解到我父亲归国之后，病情不减的情形。父亲谦恭地说：“好多了，请放心。”我站在父亲身后，注视着孙先生颀长的身材和炯炯有神的目光。一股崇敬的情绪，油然而起。他挥手示意，请我们在南面沙发坐下，目光开始移向我身上。我顿时觉得手足无措，父亲临来时嘱咐我的话语，似乎全部忘记了。我讷讷地难以启口。这时，随同孙先生下楼的几位客人，都拉开边门，走到隔壁一间的餐厅里去商议什么事情去了。

孙先生对我端详了一番说：“听你父亲介绍，在北京你曾走上街头去演讲，胆量不小。还吃了点苦头。这是值得的。怕不怕？”我腼腆地笑了一下，气氛就缓和多了。我大着胆子，立起来，垂手按着父亲教我的话说：“蒙先生关怀，在我将要出国的前夕，百忙中接见我。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不胜荣幸。”孙先生高兴地走近我身边，抚着我的肩，亲切地说：“德国医学进步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我国青年很少有机会，出国深造”。我表示一定用功勤学，不负先生厚望。孙先生又说：“听说有一些留

学生，不用功读书，学风不正，这可要引以为戒。”我从孙先生的谈话里觉得，他对青年在外国留学的情况颇为了解，使我非常钦敬和惊讶。

因为孙先生早年也是学医的，所以对于怎样学医，给了我不少指点。最后他说：“医生不但要关心治病，还要关心治国，不但要救命，而且要救民。”我用心地听着，父亲在旁也不时插上一两句，要我记住孙先生的这番教导。

正在这时，从楼梯上走下来宋庆龄女士，她穿着淡色圆角镶边的上袄，下面系着深色的裙子，乌黑的短发齐耳紧贴，更显得端庄娴静。父亲与我一同起立恭迎，她含笑地请我们坐下，也是先询问我父亲的健康状况，然后就转向问我，她勉励我勤奋学习，还问了我外文学习的情况。她一边说话，一边将一份函件递给孙先生。父亲深知孙先生日理万机，国事忙碌。就在我们交谈之际，已有好几位来客进来过，所以父亲就抽身告辞。宋女士表示挽留。父亲说改日再来，我再一次向他俩鞠躬致敬说：“我留学归来，一定再来拜见先生和夫人”。他俩送我们出会客室之后，又忙于招呼其他客人了。

在归家路上，父亲再三叮咛我，要我记住这次不平常的会见。“你今天占用了孙先生半小时之久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厚遇。你们青年人还不懂得孙先生的时间的价值呀！”

1921年，我终于踏上德国的征途。开始了七

年的留学生活。在我学成回国之时，孙先生已经不幸逝世三年之久了。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，才逐渐地意识到那次会见的珍贵和难得。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，竟然蒙孙先生接见，这是我平生最值得纪念的大事啊！

自从1920年起，我父亲因在南洋得病，留下了后患。归国后，又投身于创建中华商业银行的浩繁事业中，疲惫不堪，终于旧病添新疾，在1927年病逝上海，终年64岁。

归国后，我决心将学到的医学知识，贡献于祖国，我长时深感中国妇女受生育过多之苦，于是我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于上海首创节育之说，并潜心创制了多种形式的节育环。由此引起了风波，有人在报上载文攻击。每当我工作受到挫折，情绪消沉之时，我归家凝视着先生的题额，不由得渐愧万分。于是又鼓足勇气，面向人生。

在生活的长河里，人们往往对于身历其境的事件，缺乏深刻的体验和理解。正如苏东坡所说的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然而，当事过境迁之后阅历、知识、经验增长了，再度回忆往事，反而比当时更容易理解其深意，原因大概是当时是孤立地看待发生的事物。后来是将许多事件相互对比之后，从而窥见了事物的本质。我与孙先生的会见，就是一例很好的例证。

1984年10月，载承孙中山故居的工作同志的热

情邀请，有机会再度来到孙中山的故居。旧地重返，心潮起伏，不能自己。从1920年到今天，岁月匆匆，迩来已有66载。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我是青年时代，那时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，列强瓜分中国的阴影，笼罩着祖国大地。当我今天重返这里，瞻仰故居之时，孙先生“天下为公”的夙愿，已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实现。我虽然已是88岁之年，白发苍然，可是从这里望出去，晴空万里。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。中华巨龙，正在腾空飞跃，向着四化的宏伟目标翱翔。中山先生泉下有灵，定会含笑瞑目矣！

孙中山轶事

管 瞻

“预备总统”之争

1894年夏天，28岁的孙中山冒着酷暑，由上海赴天津，求见身居显位、在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。孙中山何许人？李鸿章从无耳闻，故假言以“老身公务繁忙，无暇会客”，不予接见。

孙中山自知人轻身微，求见无望，便效法康有为，将早已准备好的洋洋八千言的《上李鸿章书》，求门子呈送李大人，力陈自己关于“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利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”的变法自强的主张。结果还是遭到李鸿章的冷淡。不久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中国军队一败再败。这时，孙中山对腐败的清政府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，他发现，这样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。于是，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，提出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”的民主革命主张。

1895年1月，孙中山由美国来到香港，与杨衢云商谈成立香港兴中会。

杨衢云与孙中山早于1891年便有交往，其时，